

一九九八

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唐代文學研究年鑑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8)

主编 傅璇琮 郝贤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插页:1 字数:257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2 000册

ISBN7-5633-2707-X/I·244

定价:15.00元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编委会

主	编	傅璇琮	郁贤皓			
副	主	编	张明非	阎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丽娜	刘学锴	师长泰	陈尚君	张明非
		张清华	张忠纲	吴在庆	周勋初	罗宗强
		郁贤皓	党玉敏	陶敏	阎琦	董乃斌
		蒋寅	傅璇琮			
封面扉页题字		启功				

目 录

一年记事

- 第二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湘潭—张家界召开
..... (1)
- 《唐代文学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
- “李白与三峡”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六次
年会在四川万县召开 (1)

一年研究情况综述

- 初唐文学..... 李 辉 (2)
- 盛唐文学..... 毕宝魁 (9)
- 中唐文学..... 李芳民 (17)
- 晚唐文学..... 郭素华、龙坚毅 (37)
- 王维研究..... 康 震 (50)
- 李白研究..... 王友胜 (59)
- 杜甫研究..... 张忠纲、綦维 (70)

韩愈研究	张清华 (82)
元白研究	殷祝胜 (95)
李商隐研究	袁晓薇 (106)

一年论文摘要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

——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	葛晓音 (115)
论陈子昂诗歌的使事用典	徐文茂 (120)
李白诗歌的生命意识	詹福瑞 (125)
论盛中唐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	吴相洲 (129)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阎 琦 (132)
韩愈和白居易交游考	刘国盈 (136)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陶文鹏 (140)
论杜牧诗文的渊源	胡可先 (145)
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	
——以咸通十哲为例	臧 清 (148)
论唐人小赋	霍松林 (152)
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歌》到《杨贵妃》	
——悲剧与宗教的关系	张哲俊 (158)

新书选评

《浙东唐诗之路》(邹志方著)	高利华 (163)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程蔷、董乃斌著)	
.....	孟向荣 (167)
《唐代四家诗文论集》(罗联添著)	钟来茵 (174)
《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杜晓勤著)	吴相洲 (180)

《唐诗风貌》(余恕诚著)	陈文忠 (188)
--------------------	-----------

研究与整理

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与唐代文学研究	傅璇琮 (194)
《寒山拾得诗校评》的成书	钱学烈 (199)

问题讨论综述

李白长流夜郎半道放还问题研究综述	刘友竹 (202)
近二十年柳宗元研究综述	罗鸣放 (213)
李煜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李家欣 (226)
敦煌赋研究八十年	伏俊连 (236)

港台及海外研究动态

台湾香港地区的敦煌学研究	林基鸿 (245)
美国学者论唐诗的艺术技巧	周发祥 (256)

索引目录

1997 年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索引	黄高潮 (263)
1997 年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	黄高潮 (267)

一年记事

1. “中国第二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于5月23日至29日在湘潭—张家界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美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香港的110余位学者汇聚一堂，就唐代诗歌的演化规律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唐代几位重要诗人的行状考证及评价，词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宋代文学的价值和地位等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收到论文70余篇，专著4本。

2. 4月15日《文学遗产》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组织了对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的研讨会。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一种。与会专家学者对该书进行了评议，并讨论了有关文学史编写的一些问题。

3. “李白与三峡”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于10月中旬在四川万县召开。到会的专家学者有40余人，提交论文30余篇，主要就李白在三峡的游踪及诗文，李白出入三峡的时次及对创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还进行了换届选举，选出了郁贤皓为会长，薛天纬、葛景春、阎琦、詹福瑞、张成德、钱啸森为副会长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

初唐文学

李 辉

本年度的初唐文学研究文章有 20 余篇,从数量上看,与 1996 年大体相当。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文学史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考据。

在初唐文学发展史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比较注重从文学自身发展过程去探寻初唐文学的规律及特点。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产》1997 年第 5 期)一文,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对歌行形制体调的规范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由此揭示了初盛唐歌行艺术风格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及特点。葛文指出,初唐乐府歌行是在陈隋七言乐府歌行在偶句对仗进展的基础上形成独特风貌的。其特征有二:首先是七言古诗大多乐府歌行化。一方面,七言乐府题的范围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七言歌行发展的势头超过了七言乐府。初唐非乐府题的七言歌行的成熟,十分引人注目。初唐人不仅高密度地综合使用前代七言乐府中已有的各种字法和句式,而且还能使高密度地综合使用多种复沓排比句式的作法与篇章章法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其次是篇制宏伟,铺叙繁富,挥洒淋漓,将梁陈七言乐府宜于长篇赋写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一特征又突出地表现在以“篇”诗和“行”诗为代表的七言歌行中。一般说来,初唐歌行多取乐府式客观叙事的顺叙语气,也

好用对称的手法铺写场面，以求互衬对比的效果，但层次的安排更趋复杂。这种变化与七言乐府可说是同步的。总之，初唐七言乐府歌行虽以其骈俪淫靡被明清诗话视为承袭梁陈“初制”，但确立了七言歌行基本的体制规范，而且以后世难以企及的声情宏畅流转之美，成为七言乐府歌行史上不可复返的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葛文还进一步指出，初唐歌行的这一特征与其内容重在情的咏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七言在这一阶段未能完全形成其自足独立的语言节奏有关。不难看出，葛文虽然不是专门探讨初唐七言乐府歌行，却清晰、准确地揭示了初唐七言歌行在整个七言歌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及其承前启后的作用。

林继中《初唐：宫廷诗的消化》（《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则在此前对初唐宫廷诗的特点、性质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初唐宫廷诗的改造消化过程，并从中审视了宫廷诗这一形式如何被消化为唐诗的底色。林文认为，唐代开国君臣在其文学实践中将“言志”注入宫廷诗中，为初唐诗的发展定了基调。其后两批诗人作了创造性的努力。首先是“初唐四杰”，他们将自己人生的感喟与岁月蹉跎之情相交融，以情志的复合来改造齐梁以来宫廷诗为代表的新体诗，使其诗作于壮丽中时见悲怆，感喟里不无激昂，宫廷诗开始被他们消化。但“四杰”对宫廷诗的改造，更深刻地体现为题材视野的开拓，新时代精神的注入，以及刚健、明净风格的形成。其次是初唐以“文章四友”、“沈宋”为代表的宫廷诗人，他们把宫廷诗的壮丽化为雍容华贵，其作品从容于法度之中，“文理兼美”，而又不乏“健举”之风貌。也就是说，初唐宫廷诗人在保留原有宫廷诗特色的同时，又使宫廷诗发生着质的变化。林文还指出，事实上，无论四杰，无论刘希夷、张若虚，或是力倡批判齐梁遗风的陈子昂，甚至盛唐李杜，都曾认真摹写过宫廷诗，然后超越宫廷诗，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初唐雍容华贵的宫廷诗是唐诗的底色。也许林说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

是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并且肯定，初唐宫廷诗与真正意义上的唐诗确实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这一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作家作品思想艺术研究方面，陈子昂受到较多的关注，一共有3篇研究文章。其中，王祥的《陈子昂〈感遇诗〉的诗史意义》（《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王文认为，陈子昂《感遇诗》是初、盛唐诗转折的关键。从诗史角度看，其意义不在于如何关注政治，而在于对初唐诗歌词汇系统进行改造的同时，以“兴寄”为手段，以反思为动力，完成了初唐诗向盛唐诗的演变。在王祥看来，陈子昂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具有极强烈极鲜明的思辨色彩，这与当时流行的诗歌词汇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一特点必然成为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给当时及后世的诗歌词汇系统造成颠覆性的影响。所以，陈子昂的诗歌语言，实际上已显露出初唐诗向盛唐诗演进的端倪。而更重要的是，陈子昂在将老庄与玄学语汇经过改造之后移植于诗的同时，也把哲学中的理性色彩与反思精神带进了诗歌之中。诗歌主体表现了对理性的自觉追求，尤其是对终极价值的思考，这意味着文人传统的真正觉醒与回归，不再是简单的政治狂热，也不再是怀才不遇的重复吟唱。这才是陈诗诗史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在此基础上，“兴寄”作为一种表达手段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巧的意义转换过程，促成了初唐诗向盛唐诗的转变。

徐文茂的《论陈子昂诗歌的使事用典》（《学术月刊》1997年第12期），认真细致地研究了陈子昂诗歌的使事用典情况，从诗歌表现艺术的角度，反映和肯定陈子昂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徐文认为陈子昂诗歌使事用典极为普遍，其特点有四，即征引广博，紧扣现实；神理通融而褒贬有力；比照鲜明而情气浓郁；错综灵活而自然匀帖。徐文认为，陈子昂是开启有唐一代用典比兴之风的关键人物之一。陈诗的用典与诗人的诗学认识、创作精神相呼应，

其用典的成功与他在声律运用、诗体探索等方面的成就交相辉映，成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所作贡献的组成部分，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绩也是本年度初唐文学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的作家之一，研究也比较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把王绩及其作品的研究同文学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考察王绩的文学实践，总结其作品的特点及意义。曹丽芳的《王绩与山水田园诗派》（《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认为，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陶渊明田园诗之间，有割不断的精神联系，王绩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题材视点上，王绩第一次把田园诗与山水诗结合起来，表现了田园中的林泉之致，这标志着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初步合流。在对待人生行藏的态度上，王绩是从陶渊明固志守穷到王维身心相离的中间环节。在思想深度上他无法与陶诗相比，但其随遇自适、追逐个性自由和安逸的表白，更近于盛唐人所崇尚的自然。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开始注意创造物我相融的意境美，使客观的自然界与人的主观心境和谐一致，初步具有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流畅秀美的艺术风貌。显然，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王绩及其作品，使我们对该作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张海沙的《“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学术研究》1997年第10期），不仅注意到了王绩诗歌对意境的追求及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且从大乘禅法对他的思想及人生追求的影响入手，深入探讨其文学主张及创作实践。张文认为，王绩以大乘禅法“色即是空”的思想为基础，追求率性自适的人生，追求个性的张扬，他的归隐实际上并非消极的人生退缩，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生的积极追求与进取，体现出在大唐盛世这个历史背景下，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对主体意识的注重。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诗歌以“会意”为功，即文学艺术的创作，重在创作主体主观意兴的表达，即使描

写客观事物，也重在把握对象与主体心境相符的整体特征。实际上也就是让诗人的个性、主体意识在诗歌创作领域得到张扬。他的文学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文学主张，形成了平淡疏野的诗风，创造出悠远的意境，在初唐诗坛独树一帜，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关于其他初唐作家，如李世民、刘希夷、杜审言、张若虚等，也都有研究文章。李世民的文学创作近两年颇受重视，去年学者们主要研究其诗歌成就，本年度王许林的《武功定天下，文德绥海内——试论唐太宗之赋》（《江淮论坛》1997年第2期），对李世民现存的五篇赋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王文认为，李世民在其“反淫放，重劝戒”为核心的文学思想指导下，在赋的题材选择、主题开拓和构思布局等方面，基本上抛开了汉赋及六朝文人习见的创作模式，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和个性色彩。因而，从赋体文学演变发展的角度看，李世民的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其一，初步扭转了六朝以来赋风的堕落，并开一代新赋风先河，具有“纠弊”和“拓新”之双重意义；其二，初步体现了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

由于李世民特殊的身份地位，他的文学创作的价值意义和影响力，自然会超越其作品本身，从这一意义上讲，对李世民作品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过去我们对此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李世民文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对初唐作家作品的考证，是本年度初唐文学研究中必须提到的一个方面。在这方面，今年发表的文章有5篇。其中王启兴的《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考辨》（《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甚见功力。清编《全唐诗》是唐诗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诗篇重出互见较多，则是这部诗歌总集令人遗憾的一个缺陷，影响了唐诗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对《全唐诗》中诗人重出诗篇的考辨，也

是唐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方面唐代文学研究者近些年已取得很大的成绩。王文对《全唐诗》中沈佺期、李峤、刘希夷三位诗人的重出诗，在掌握有关材料的基础上，逐一考察辨析，判其归属。文中征引的资料翔实，论证充分，辨析有力，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重出诗篇的归属判定，成一家之言。有利于今后深入开展对这三位诗人诗作的研究。

另外，刘中文的《“五津”小考》（《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着眼点虽小，但用功颇深，持论有据。刘文指出，古代蜀中的“五津”，其确切位置应在今四川都江堰市至彭山县一段的岷江沿岸。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就意味着过去所有对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五津”的解释都是错误的。当然，弄清楚这一问题，对理解王勃此诗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初唐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需要刘文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和方法。这是我们切实推进初唐文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综观本年度的初唐文学研究，有两个可喜的特点值得一提。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求真务实的精神有了更为明显的体现和落实。一些文章不仅具有很强的史的观点，从纵向上审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且还能同时深入到其内部，从横向上进行细致的解剖和分析，比较令人信服地加以论证和说明。其成果的意义实际上已超出该成果本身，有益于良好治学风气的形成。二是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葛晓音对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和总结，王启兴对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的考辨等，都是其中的力作。

尽管成绩可喜，但本年度初唐文学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也明显存在。主要有两点。一是过去研究中表现出的浮躁，在一些文章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主要表现为一些研究中得出的理论

总结，往往缺乏足够的依据支撑。二是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低层次的重复选题和重复研究依然存在。这些不足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势必影响到初唐文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盛唐文学

毕宝魁

1997 年的盛唐文学研究园地中又出现一批比较可喜的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比以前都有所发展。据笔者所见，除李白、杜甫、王维三大诗人外，其他研究盛唐文学的文章在 30 篇以上，并出现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或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研究领域有所拓展；或研究比较深入，有一些新见；或从宏观上切入，从总体上把握盛唐气象对文学的影响；或从微观入手，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考证。下面从几个方面概括一下本年度盛唐文学研究的概貌。

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文史哲》1997 年第 4 期）便属于宏观研究的文章。文章认为：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文章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前提下，分 4 个层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1. ‘吏治与文学之争’虽说于玄宗朝

表现得最明显，但实际上在武则天时已初露端倪。”从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执政大臣时所持的标准就可看出他重用吏才，鄙薄文士的观点，成为后来姚崇、宋璟用人观的滥觞。“2. 严格意义上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开始于开元元年（713）。”张说、刘幽求入相后，便想办法阻挠姚崇入相。姚崇、宋璟先后入相执政后，便将张说、刘幽求等文学之臣排挤出朝廷的核心领导层。姚崇、宋璟的先后执政，对盛唐全盛日的到来是有贡献的，但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又是不利的，这就是他们“鄙薄、压制文学之士，使朝中无法形成一个诗人群体”。正因为如此，“开元前期朝廷中善诗之人寥寥无几，形不成一个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动极少”。“3. 姚崇、宋璟等人用事期间，不但重用吏干之臣，还提倡实用之文，以达到改变当时士风、文风之目的。”“4. 从开元九年张说再次为相之后，情况又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总的来说，张说等‘文学’一派在开元前期政坛、宫廷文坛都处于劣势，而且张说开元九年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到开元十五年以后才显现出来。因为在诗坛冷寂近十年的京城要重新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诗人群体，营造一个以诗文相尚，以清新、壮丽为美的诗歌创作风格，不但需要有一大批善诗能文之士来到京城，跻身宫廷，而且必须靠科举选士、评诗衡文过程中对姚、宋‘吏治’派文风的反拨，对新的诗风的有意识的提倡。而开元十年至十五年之间正是这样一个诗坛复苏期。……因为开元中后期张说、张九龄等‘文学’一派主持政坛、文坛达15年之久，都城诗坛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实，文章所论述的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只不过是用人方面的具体体现而已。杜文对武则天后期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张说和张九龄对盛唐文学繁荣的贡献。文章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辽宁大学学报》1997